

大型工程非自愿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

——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证分析

胡 静 杨云彦*

摘要: 本文通过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移民的研究发现,经历过一次非自愿搬迁的二次移民的人力资本对贫困状态的改善存在着失灵的现象。这是由于强行使非自愿移民离开原有的熟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断裂,人力资本的效率大大下降。因此,需加强对非自愿移民的针对性技能培训,增强移民对新生活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使人力资本存量重新发挥作用。

关键词: 非自愿移民 人力资本失灵 贫困

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旨在改变现有福利的工程建设项目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与此相伴产生了大量因项目征地所造成的非自愿移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内,全世界由于水利、交通、机场、港口等工程建设产生的移民多达2亿人,平均每年1千万。这些工程项目以发展经济、合理利用资源和改变贫困为目标,在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并提高了他们的福利的同时,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原有的生活体系、社会体系遭受了彻底的颠覆。这部分群体便是非自愿移民。国内外已有众多的学者对非自愿移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贫困”,也就是说非自愿移民贫困的广泛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Cemea(1998)认为非自愿移民会导致移民面临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失去家园、向边缘地区搬迁、食品无保障、健康水平下降、丧失共同物质财产以及社会网络的破坏等风险,从而加大移民贫困的风险。Mathur(1995)认为移民搬迁所产生的社区的破坏、家庭的分离、生计的毁灭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在印度,在过去40年里,75%的工程移民在迁移后,其生活状况比迁移前变得更差了(Parasuraman, 1999)。

对于非自愿移民贫困的形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学者在对移民的调查分析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1500万水库移民中,约有1/3移民重建了家园,恢复和改善了生活水平;1/3移民勉强可以维持生计;还有1/3移民处于绝对贫困之中(余文学、高渭文、张云,2000)。张绍山(1992)认为水库移民过程中,移民面临着贫困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面积减少、质量恶化、原有职业丧失、社会经济地位区域边缘化以及其他诸如失去公共资源权利。但这种贫困是因修水库而产生的,因此水库移民的贫困属于“次生贫困”。与其有相同观点的如陆远权(2002)认为库区移民存在着历史性贫困,在搬迁后的一段时间内又面临着经济、文化、精神等贫困,造成这种贫困的因素主要有移民安置规划上的缺陷、失去土地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迁移的经济损失、异地文化的歧视与排斥和低素质的人口等因素。此外,陈绍军(2003)、朱东恺(2006)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 胡静,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邮政编码:430205,电子信箱:hjing220@qq.com;杨云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邮政编码:430070,电子信箱:yang84@hotmail.com。

本文系杨云彦教授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编号05JZD0001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在决定个人收入地位的诸多个人禀赋中,人力资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在目前以知识为强力引擎促进经济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突显,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推动因素。自从舒尔茨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国内外无数的实证研究都证明了个人的人力资本与工作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学者发现了人力资本的悖论。国外学者主要从人力资本贬值(human capital depreciation)的视角来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决定的悖论。Moreh(1973)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能够减少收入能力的因素都意味着人力资本贬值,这些因素包括所获培训知识的过时、由生理和心理因素引起的记忆力减退和年龄偏高时对闲暇的强偏好,失业、不充分就业、退出市场等都直接影响了人力资本的收入能力。Lance Lochner(2004)对服刑人员、失业者和处于生育期的女性三类较为特殊的劳动力进行研究,发现其人力资本的收入能力是下降的。Shephard(2000)在一篇名为《年龄和劳动生产率》的文章中指出,人的反应速度、敏锐性、肌体技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退化,进而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率导致人力资本的失灵或贬值。国内学者提出人力资本失灵概念的是李培林、张翼(2003),他们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约1000个下岗工人样本的抽样调查发现,在中国的大转变时期,快速的社会变动使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存在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文化程度、技术水平以及经验)对于提高其收入和促进其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市场的知识需求和职业结构变化,使下岗职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出现断裂。刘平(2004)在其论文中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地拓展和应用,认为人力资本失灵现象不仅是对市场需求状况的验证,也是对构成人力资本必要前提的劳动者是否具有自由选择主体意识的验证,人力资本失灵不仅是人力资本要素本身的失灵,也是社会机制的失灵。人力资本失灵的概念对于理解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皮建才,2007)。

归纳起来国外学者对人力资本失灵或贬值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微观个体的状态,如健康的改变导致生理心理的变化;年龄拐点的到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失业、再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等个体经济行为;女性生育、服刑服役等特殊社会行为。而国内的研究者则主要从宏观的社会变迁、制度变革、技术变迁、市场转轨和产业结构改造的视角考察宏观层面主导的人力资本失灵。非自愿移民这一群体是否存在人力资本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不再发挥作用的现象?如果存在这种人力资本失灵,其产生的原因是否来自于外力的介入和冲击,即政府主导和完成的资源重新分配,强行使非自愿移民离开原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断裂?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基于此,我们从理论和经验上回答非自愿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是否所有的移民都会产生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对于那些存在人力资本失灵现象的个体,如何能应对这种人力资本失灵。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本文使用的数据与变量的介绍;第三、四部分是模型的设定、实证分析和说明;第五部分是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数据与变量介绍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采用的是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库区移民的抽样调查数据,该抽样调查数据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经济研究所于2007年8月期间选择了湖北省丹江口、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进行的农户入户调查,抽样方法采取按相关标志(移民比重)分布的分层整群抽样。具体实施时考虑了收入分布、村组的移民分布和乡镇中村组的规模。实际调查的农户占库区相关总体移民区的比例为4.78%,包括了3县24乡镇、58村、118组、3145户、13000余人。调查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农户家庭的经济社会信息、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对迁移预期的评价。为了进一步剥离出非自愿搬迁这一经济行为对个体人力资本的影响,我们将样本分为“原居民”和“二次移民”,“原居民”是没有经历过非自愿搬迁世代居住在调查地的居民,而二次移民则已经经历过一次非自愿搬迁,我们将这两类人群进行对比分析寻找人力资本对贫困状态影响

我们所调查的南水北调工程的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同时也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丹江口水库“后靠”的移民,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经历过一次非自愿搬迁,这里我们将其定义为“二次移民”,而将世代居住在库区此次为第一次非自愿搬迁的待迁移民定义为“原居民”。

的差异。

(二)变量介绍

本文探讨的是非自愿移民人力资本对其贫困状态的影响,因此因变量为调查户家庭是否为贫困家庭,自变量的选取依据本文的分析目标以及已有的参考文献,按照家庭的基本特征、家庭的资产特征、家庭人力资本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分类选取,其中人力资本特征依照人力资本投资的经典定义分为健康状况、正规教育、培训及迁移,家庭的基本特征、资产特征和经济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取值与说明如表 1:

表 1 变量的取值与说明

变量	取值与含义	总样本		原居民		二次移民	
		均值	离差	均值	离差	均值	离差
家庭有老人数量	没有 =0,有一个以上 =1	0.36	0.63	0.35	0.62	0.37	0.63
家庭有学生数	没有 =0,有一个以上 =1	0.86	0.92	0.87	0.91	0.85	0.94
家庭有未成年人数	没有 =0,有一个以上 =1	0.71	0.85	0.70	0.81	0.71	0.88
家庭规模	家庭规模的平方	22.04	15.74	22.07	15.39	22.01	16.07
耕地质量	不好 =1,一般 =2,好 =3	1.09	0.83	1.21	0.81	0.99	0.83
交通工具得分**	连续性变量	2.97	2.65	3.07	2.66	2.87	2.63
信息交流工具得分*	连续性变量	1.56	2.10	1.39	2.08	1.72	2.10
平均受教育年限	家庭总教育年限除以家庭人数	6.80	2.59	6.79	2.56	6.81	2.62
新技术的使用态度	不使用 =0,使用 =1	0.94	0.23	0.94	0.23	0.94	0.24
技术交流能力	不交流 =0,交流 =1	0.69	0.46	0.69	0.46	0.68	0.46
技能培训参与度	不参与 =0,参与 =1	0.71	0.46	0.70	0.46	0.71	0.45
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数	没有 =0,有一个以上 =1	1.37	1.19	1.40	1.17	1.34	1.21
见识(最远足迹)	只去过本县 =0,以外 =1	0.70	0.46	0.71	0.45	0.69	0.46
家庭健康状况	医药支出占总收入 20%以下 =1,占总收入 20%~50% =2,占总收入 50%以上 =3						
家庭收入来源结构	农业收入为主 =1,经营收入为主 =2,工资收入为主 =3,转移收入为主 =4						

注: *信息交流工具得分是根据家庭所拥有的通信工具赋值得到的,没有任何通信工具 0分,1部电话 1分,1部手机或小灵通 2分,家庭的信息交流工具得分为其汇总而来。 **交通工具得分是根据家庭所拥有的交通工具赋值得来的,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0分,两轮或三轮摩托 1分,电动车 2分,手扶拖拉机、农用三轮车 3分,小轿车 4分,货车 5分,家庭的交通工具得分为以上各项汇总而来。

三、非自愿移民的贫困致因与人力资本部分失灵

描述某一区域某一群体的贫困状态必须确定贫困线的标准。由于所采用的调查数据为 2006年的家庭收入和支出,因此本文将国家统计局 2007年发布的低收入贫困线作为研究标准,2007年全国极端贫困人口(赤贫人口或不得温饱贫困人口)认定标准为 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693元以下,低收入贫困人口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693元以上 958元以下。因此本文将样本数据以家庭为单位,户人均纯收入在 958元以下的定义为低收入贫困户。

(一)模型的设定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的人力资本与收入决定、阶层认同、社会态度的理性化都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力资本失灵则是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文化程度、技术水平以及经验)对于提高其收入和促进其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我们在此想考察非自愿移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其贫困状态的解释作用,因此模型中的因变量为家庭是否贫困,贫困取值为 1,非贫困取值为 0,自变量为人力资本的 4种形态,家庭的基本特征、资产特征、经济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我们用 Binary Logistic 模型来深入考察影响人力资本要素对非自愿移民贫困的影响,模型如下: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n x_n$$

其中 p 为贫困的概率, β_i 为系数, x_i 为家庭个人特征变量。

(二)模型结果的解释

1. 无外力介入的“原居民”的人力资本效用

国务院扶贫办, http://www.cpad.gov.cn/data/2007/0404/article_333613.htm.



在“原居民”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贫困的 39.8%解释来自于家庭和个人的资源禀赋和能力。家庭规模、收入结构、信息交通工具的拥有量、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耕地是显著影响家庭贫困的因素,其中家庭人力资本特征对贫困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作用。

表 2 非自愿移民贫困的致因: Binary 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原居民		二次移民	
		系数	OR值	系数	OR值
家庭基本特征					
	家庭有老人数	- 0.041 (0.120)	0.960	- 0.006 (0.104)	0.994
	家庭有未成年人数	- 0.047 (0.127)	0.954	- 0.052 (0.105)	0.949
	家庭有学生人数	- 0.028 (0.128)	0.973	0.059 (0.105)	1.060
	家庭规模的平方	0.038*** (0.008)	1.039	0.021*** (0.007)	1.021
家庭资产特征					
	耕地质量一般	1.298*** (0.202)	3.660	0.569*** (0.171)	1.766
	耕地质量不好	0.787*** (0.191)	2.197	0.281 (0.174)	1.325
	信息交流工具得分	- 0.276*** (0.043)	0.758	- 0.189*** (0.036)	0.827
	交通工具得分	- 0.077* (0.049)	0.925	- 0.138*** (0.040)	0.871
家庭人力资本特征					
正规教育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	- 0.094*** (0.031)	0.969	- 0.031 (0.037)	0.911
培训	使用新技术	- 0.359 (0.293)	1.007	0.007 (0.428)	0.698
	技术交流	- 0.664*** (0.175)	0.515	- 0.296** (0.150)	0.744
	技能培训主动性	- 0.200 (0.176)	0.819	- 0.109 (0.161)	0.896
迁移	家庭外出务工人员	- 0.097 (0.092)	0.908	0.057 (0.082)	1.059
	见识	- 0.504*** (0.142)	0.883	- 0.125 (0.171)	0.604
健康	家庭健康状况一般	- 1.765*** (0.217)	0.171	- 1.735*** (0.190)	0.176
	家庭健康状况良好	- 0.673*** (0.255)	0.510	- 0.892*** (0.230)	0.410
家庭经济特征					
	农业收入为主	0.195 (0.300)	1.216	0.358 (0.238)	1.430
	经营收入为主	- 0.371* (0.245)	0.690	- 0.727*** (0.210)	0.483
	工资收入为主	- 1.429*** (0.244)	0.240	- 1.349*** (0.220)	0.260
	常数项	1.206	3.339	2.483	11.979
	- 2倍的对数似然值	1.036	0.339	1039.774	
	Cox & Snell R ²	0.263		0.247	
	Nagelkerke R ²	0.398		0.353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在 1%、5%和 10%水平上的显著性。

(1)正规教育对贫困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依然发现家庭受教育的状况对贫困的改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开始是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来代表整个家庭的受教育状况,结果发现和以往的研究不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是否贫困并不显著,但是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家庭中并不是完全依靠某一个人的能力才能摆脱贫困,而是整个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提高,才会对家庭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

(2)培训项目中,技术交流的能力对贫困的缓解有显著作用,而使用新技术以及技能培训的主动参与度虽然对贫困的减少有正向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3)迁移项目中,家庭成员的见识也对贫困的缓解发挥着显著作用,那些最远只到过本县的家庭和去过县城以外的家庭相比,贫困发生的概率是 1.4 倍。而家庭中外出打工人数对缓解贫困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关系也不显著,这似乎与许多学者研究的结论有所不同,但也是存在一定的道理的。这是因为外出打工对收入的影响不能从数量上得到反映,也就是说并不是外出打工的人数越多,家庭就越富有,打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取决于打工所从事何种工作,工作的报酬如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家庭收入结构中得到验证。

(4)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状况是贫困致因的显著因素。疾病是家庭贫困最大的风险,一旦家庭中有成员患病,对于农村家庭的打击有时是致命的。移民更是如此,我们将医药支出占总支出 50%以上的家庭作为对照组,发现这类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是医药支出占总支出 20%的家庭的 5.68 倍,是医药支出占总支出 20%~50%之间的家庭的 2.18 倍。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对于原居民这些从没有受过外力冲击和介入的居民,人力资本对贫困状态的缓解是

存在显著的作用的。这与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完全吻合的,至于培训的无效率,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

2. 外力介入下的“二次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二次移民与原居民在贫困的显著致因以及人力资本的各项因素对贫困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为:

(1)正规教育不再是影响贫困的显著因素,我们将代表家庭正规教育的变量如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代入模型中均不显著。

(2)培训的各个变量,技术交流依然能对家庭缓解贫困起到显著作用,但程度相比原居民却下降了。在原居民的模型中,不进行技术交流的家庭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是进行技术交流的家庭的 1.94 倍。而二次移民的家庭中,这种倍数则变成了 1.34 倍。同时是否使用新技术和技能培训依然不显著。

(3)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迁移,也不再是影响贫困的显著因素。家庭的见识即最远足迹对贫困的缓解不再发挥作用。而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不仅对家庭的贫困没有缓解作用,反而有加剧的作用。在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到二次移民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对贫困的影响是相反的方向,系数为正。

(4)家庭的健康状况在所有模型中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因为疾病是农村家庭贫困的最大风险,一旦家庭中有成员患病,对农村家庭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一特征不仅在原居民模型中得到反映,在二次移民的模型中也得到同样的反映。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发现,遭受过非自愿搬迁的二次移民人力资本对其缓解贫困不再发挥显著作用,某些因素甚至还会加剧贫困的程度,这正是我们认为的人力资本失灵,但是二次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并不是完全失灵,而是部分失灵。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依然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通过对样本中原居民和二次移民分别研究,我们发现原居民的人力资本效用符合传统理论,而二次移民的人力资本却产生部分失灵的现象。原居民和二次移民在面对同样的自然和宏观条件下,人力资本禀赋对贫困的贡献却大不相同。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二次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是由于外力的冲击和介入,即政府主导和完成的资源重新分配,强行使非自愿移民离开原有的熟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断裂,其原有的生产技能、经验、见识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生产方式时可能一夜之间完全失灵,人力资本的效率大大下降。

四、非自愿移民人力资本失灵的分层

那么是否所有的非自愿移民都会产生人力资本对贫困改善的失灵现象呢?如果只有部分非自愿移民会产生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这部分群体又是什么特征的群体?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将研究对象仅限于二次移民,此时样本量为 1 534 户。从表 3 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若移民家庭以农业收入或转移性收入为主,则贫困的比率非常高,这说明农业收入对于移民家庭而言只能成为其基本的保障收入,家庭若以农业收入为主,则无法较好地提高收入,摆脱贫困。而那些以转移收入为主的移民家庭则多是没有劳动能力依靠救济和救助生活的家庭,但无论是公共转移支出还是私人转移支出都很难将家庭带出贫困的泥潭,所以这一类家庭的贫困比率甚至还要高出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移民家庭。和以往研究的结论相同,家庭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移民家庭,贫困率最低 14.5%,其次是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移民家庭。同时上一个模型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表 3 二次移民户收入结构与贫困率

		是否贫困家庭					
		非贫困			贫困		
		频数	行比重	列比重	频数	行比重	列比重
家庭收入来源结构	农业收入为主	214	55.6%	10.2%	171	44.4%	22.5%
	经营收入为主	618	72.6%	29.4%	233	27.4%	30.7%
	工资收入为主	1 093	85.5%	51.9%	185	14.5%	24.3%
	转移收入为主	180	51.3%	8.6%	171	48.7%	22.5%

我们同时也想了解不同的经济类型的家庭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是否存在区别,当我们将研究对象根据

家庭经济特征划分为 4 种不同类型仍然采用与上述模型相同的方法进行 Binary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失灵的分层确实存在,回归结果如表 4。

表 4 非自愿移民人力资本失灵的分层: Binary Logistic 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农业收入	经营收入	工资收入	转移收入
家庭基本特征					
家庭有学生人数		- 0.045 (0.146)	- 0.073 (0.126)	0.055 (0.114)	0.203 (0.212)
家庭有老人数		0.301 (0.199)	- 0.142 (0.146)	0.027 (0.156)	- 0.161 (0.190)
家庭规模的平方		0.018** (0.009)	0.010 (0.008)	0.019*** (0.007)	0.004 (0.011)
家庭人力资本特征					
正规教育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	- 0.072 (0.056)	- 0.102*** (0.039)	- 0.094** (0.042)	- 0.155*** (0.049)
培训	使用新技术	0.481 (0.831)	0.079 (0.482)	- 0.720** (0.378)	- 0.161 (0.414)
	技术交流	- 0.338 (0.266)	- 0.296 (0.205)	- 0.411** (0.191)	- 0.461** (0.259)
	技能培训主动性	- 0.175 (0.290)	- 0.315 (0.212)	0.028 (0.202)	- 0.467* (0.286)
迁移	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数	- 0.068 (0.144)	0.017 (0.104)	- 0.345*** (0.104)	0.224 (0.142)
	见识	- 0.179 (0.257)	- 0.687*** (0.191)	- 0.481*** (0.184)	- 0.334 (0.253)
健康	家庭健康状况一般	- 3.060*** (0.555)	- 2.271*** (0.255)	- 1.535*** (0.249)	- 1.180*** (0.294)
	家庭健康状况良好	- 1.929*** (0.604)	- 1.079*** (0.306)	- 0.310 (0.282)	- 1.002*** (0.373)
家庭其他特征					
耕地质量一般		0.904*** (0.305)	0.705*** (0.227)	1.218*** (0.226)	1.175*** (0.303)
耕地质量不好		0.644** (0.288)	0.592*** (0.219)	0.802*** (0.233)	0.539** (0.298)
常数项		1.923** (1.074)	1.681*** (0.612)	0.580 (0.565)	1.717 (0.568)
- 2倍的对数似然值		414.786	789.581	876.054	409.118
Cox & Snell R ²		0.245	0.207	0.126	0.192
Nagelkerke R ²		0.328	0.300	0.224	0.256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在 1%、5%和 10%水平上的显著性。

1. 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人力资本除健康外几乎全部失灵。这是因为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土地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按照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制度,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大致相当,但是耕地的质量却有着较大的区别,特别是对于有移民的村庄,由于移民原有的耕地是经过多年的选择,一般是当时当地最为肥沃最适合耕种的土地,补偿的土地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大多是贫瘠难以开发利用的土地,这样的土地或生产资料使得人力资本难以发挥效用。另外农业的生产技术会因为生产条件的改变而完全失去作用,比如我们在调研时发现移民之前以种植水稻、棉花为生,但搬迁后当地无法进行相同类型的种植,而导致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无用武之地,新的生产方式需要重新学习和不断通过实践磨合,因此人力资本会表现出相当严重的失灵现象。

2. 以经营收入为主的家庭表现出人力资本的部分失灵,但人力资本的三种主要形式——正规教育、迁移和健康依然是显著改善家庭的贫困状态。只有培训这一项对缓解贫困没有任何贡献。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类家庭的人力资本效用基本上是符合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对收入的贡献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3. 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人力资本的所有内容都与缓解家庭贫困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类家庭的劳动力大多从事非农工作,农业收入作为生活保障和降低非农工作成本的作用更多一些。这类家庭的劳动力一般具有两栖性,找到工作则留在非农领域,找不到工作则退回土地寻求最后的生活保障,因此非自愿搬迁对于这一类家庭人力资本的损害是相对比较少的。无论是农业安置还是非农安置,都不会影响家庭成员外出工作的技能和收入,因为家庭和耕地只是他们最终的保障,人力资本对其收入能力的决定作用不会受到外力的冲击,依然保持对收入能力的正面影响。

4. 以转移收入为主的家庭多是没有劳动能力依靠补贴和救助生活的家庭,但无论是公共转移收入还是私人转移收入都很难将家庭带出贫困的泥潭,所以这一类家庭的贫困比率甚至还要高出以农业收入为主的。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类家庭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并没有以农业收入为主的非自愿移民家庭人力资本失灵现象严重,正规教育依然对缓解贫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点也并不难解释,国家扶贫政策细致复杂,工作程序也相当繁琐,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对政策的解读能力更强,接收补贴扶助的可能性更大。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是基于人力资本效用变化的角度探讨非自愿移民的贫困问题。由于外力所导致人力资本对收入和贫困改善的解释失灵,是非自愿移民贫困的根结所在。当前的移民政策采取的是前期补偿、后期扶持政策,在移民的安置规划中是以农业安置为基础,就近后靠为主的方式,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行政手段将大量的库区移民移植到附近的村庄生产生活。这种政策对人力资本效用的恢复无法起到实质性的帮助。非自愿移民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在新的迁居地又无法短时间的形成社会网络资本弥补人力资本的缺位,此时若没有政策的帮扶,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恢复生活水平,摆脱贫困。因此在移民的安置规划中,应充分发挥移民亲缘、地缘等社会资本的作用,考虑移民原居住地与接纳地在学习方式、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上的类同和兼容性,使得人力资本积累能保持延续。另外培训是重新激活人力资本存量的一种有效途径。培训不仅可以帮助修复中断的人力资本积累,也是促进移民与迁居地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渠道。我们在实地调研并与当地村干部和村民进行访谈时,村干部对于解决贫困提到的最多的建议就是技能培训,绝大多数村民也表达了积极参与的愿望,这说明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都将技能培训作为一个重要的脱贫致富的手段。但我们通过模型分析却发现,无论我们将样本分为原居民和二次移民,还是再将二次移民依据家庭收入结构的不同划分为4种类型,技能培训对于贫困的缓解是完全失灵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却是如此之大,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移民培训的效率以及对移民培训的模式重新定位。首先,针对移民的技能培训必须要以提高移民的非农就业能力为主,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工资收入为主的非人力资本并没有失灵,因此加强移民的非农就业能力的培训,有助于最大可能地发挥人力资本存量的效用;其次,移民培训要针对迁居地的生产生活特性,在搬迁前就逐步展开,搬迁后跟踪服务,增强移民对新生活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使人力资本存量重新发挥作用;最后培训不仅仅是劳动技能的培训,还应包括引导移民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帮助其克服心理障碍,促使其积极参与决策,真正实现移民人力资本的全面恢复和重建。

参考文献:

1. 陈绍军、施国庆:《中国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11)。
2. 陈绍军、荀厚平:《中国非自愿移民收入来源与风险分析》,载《河海大学学报》,2002(2)。
3. 陈绍军、施国庆:《中国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5)。
4. 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5)。
5. 刘平:《“人力资本失灵”现象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从李培林、张翼在东北的发现谈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3)。
6. 陆远权:《浅析三峡库区移民过渡期的贫困问题》,载《人口与经济》,2002(1)。
7. 皮建才:《如何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基于人力资本失灵视角的考察》,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8. 杨云彦等:《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载《管理世界》,2008(11)。
9. 余文学、高渭文、张云:《水库移民问题的社会经济分析》,载《河海大学学报》,2000(4)。
10. 张绍山:《水库移民的“次生贫困”及其对策初探》,载《水利经济》,1992(4)。
11. 朱东恺、施国庆、潘玉巧:《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利益补偿机制改革思路与建议》,载《中国软科学》,2006(1)。
12. Cemea, Michael M., 1988.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Some Projects have Adverse Social Effects Can These be Prevent?"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33(3), pp. 44 - 46.
13. Parasuraman, S., 1999.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4. Moreh, J., 1973. "Human Capital: Deterioration and Net Investment"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19, pp. 279 - 302.
15. Lochner, Lance, 2004. "Education, Work and Crime: A Human Capit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3, pp. 811 - 843.
16. Shephard, Roy J., 2000. "Aging and Productivity: Some Physiological Iss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 25, No 5, pp. 535 - 545.

(责任编辑:孙永平)